

克拉克·克尔：“用”与巨型大学

熊华军, 李 伟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在美国高等教育家克拉克·克尔看来,作为当代一种新型大学,巨型大学是因“用”而生,然而也正是“用”使得巨型大学内外部产生不平衡,并且不利于巨型大学的发展。这就需要巨型大学对其内外部的不平衡作出回应,从而平衡各方利益,推动大学向前发展。

关键词:克拉克·克尔;巨型大学;现代大学管理;大学之“用”;大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志码:**C **文章编号:**1672-8742(2011)06-0081-06

一、“用之果”:巨型大学的产生

巨型大学不是无源之水,它孕育于大学“用”史之中,形成于当代的现实之“用”。

首先,巨型大学形成于大学的“用”史。在美国高等教育家克拉克·克尔看来,巨型大学不仅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这三类传统之“用”,还有促进社会公平、提高生活质量、加速政治改革之用,还有对青年的剩余责任、关于社会未来的有组织的思考等当之“用”^{[1]246-256}。不过,这些“用”蕴含于大学的历史之中,尤其体现在古希腊大学之中。在古希腊,城邦的发展是一切发展之源,但城邦的发展奠定在青年发展的基础上。只有青年发展了,城邦才能发展。为了促进青年的发展,哲学家义无反顾地承担了培养青年的重任。在哲学家看来,一个青年真正成为一个城邦的公民,需具备节制、勇敢、智慧、正义等美德,为此他们不仅要培养青年的基本生活技能,而且要培养青年的生活美德。在古希腊,美德教育是最重要的教育,一个青年的美德也就是城邦的美德。只有每个青年都具有了城邦的美德,城邦才能长治久安。可见,当代大学之“用”都体现在古希腊大学中。中世纪大学不仅为国家培养公务员、医生、法官和牧师,还承担了人的心灵教育的责任,因为这关切到如何信仰上帝的问题。为了让人真正地信仰上帝,中世纪的大学教师并不是一味地灌输《圣经》教义,而是通过诠释、辩论等研究方式,以理性促进信仰。以洪堡大学为代表的近代大学,倡导教学与

基金项目:西北师范大学“知识与科技创新工程”项目(NWNU-KJXCXGC-SK0303-11)。

作者简介:熊华军(1975-),男,湖北仙桃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大学教学。

李 伟(1985-),男,山东临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大学教学论。

研究相统一、教与学相统一、各学科相统一的原则,不仅为德国培养了一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而且塑造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为德国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军事强盛做出了贡献。以美国赠地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以社会服务为其精神,开创了大学发展的另一个黄金时代。

其次,巨型大学是当代的“用”之产物。尽管“用”是大学的历史遗传,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用”的凸显并不全面:古希腊大学是为了城邦的繁荣,中世纪大学是为了上帝的信仰,近代大学是为了民族崛起,现代大学是为了社会服务。当代大学之“用”名目繁多,不是单一之“用”,而是综合之“用”,这是时代之“用”赋予大学的使命。在克尔看来,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赠地运动的兴起。为了适应美国工业和农业的快速发展,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签署了莫雷尔法案。该法案主要内容为:联邦政府向各州赠拨一定数额的土地,各州须以此土地出售所得资金为资本,开办以讲授农业和机械制造工艺知识为主的专门学院,以满足平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要求,为州和地方培养技术人才,进而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因此,美国大学集教学、科研和服务于一身。

第二,为大学拨款的兴起。在“二战”和冷战期间,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美国联邦政府资助一部分大学进行科学研究,并在这些大学里成立了许多实验室,如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芝加哥大学的阿尔贡实验室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劳伦斯放射实验室。巨额拨款为这些大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尤其是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与哈佛大学同样的社会声誉。加之随后出现的以原子能、电子、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拉开了大学和军事、工业联合的序幕,致使大学的科学研究向多元化趋势发展。

第三,战后法案的颁布。“二战”和朝鲜战争后,“战后婴儿”现象使美国高等教育面临巨大的入学压力,《退伍军人法案》、《国防教育法》及其相关法案的颁布,使美国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转变——入学人数急剧上升,高校数量迅速增多,规模不断扩大,高等教育民主化的呼声日渐高涨,等等。在这些环境的影响下,克尔认为,社会需要的人不仅是一个积极的公民,还应是积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从公民的角度来说,他了解一些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区生活的管理知识,能批判性地分析现存社会的目的和行为,为弱势群体谋求福利等。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说,他能以一技之长谋求一份职位,包括用新思想和新技术服务社会的能力、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能力、适应社会变革的能力、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他不但知晓本民族、本国家的文化遗产,也了解他民族、他国家的文化精髓,从而能与他人愉快地交流。

既然巨型大学之“用”孕育于大学发展史之中,成于当代之“用”,那么巨型大学的“用”到底表现在那里,与普通大学的区别又在那里?在克尔看来,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巨型大学,并不在于其面积之大、楼房之多,而在于多元化的目标、职能和组织。

从目标看,巨型大学之“用”表征为目标多元化。克尔之所以用巨型大学来形容美国的现代大学,因为美国大学拥有若干个目标,它既要致力于追求知识、培养人才又要承担解决社会问题的任务。例如,“为学生个人智力的、审美的、伦理的和技能

的发展提供机会,并在学生比较一般的发展成长中,提供建设性地帮助他们的校园环境;普遍的在社会上促进人的能力;为中学后年龄组扩大教育公平;学问和智慧的传递和促进;使管理对社会的批判性评价的运行更好;更加关注学生的职业准备”^{[2]222-225}等。这些教育目标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大学的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而是关注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从职能看,巨型大学之“用”表征为职能的多元化。社会发展要求大学是一种多元的机构,它既不像中世纪大学那样匍匐在上帝脚下,也不同于近现代大学的理性文化抑或其他目标。它服务于多样化的组成群体,有多样化的使命。它致力于机会平等,致力于调和平等与优秀之间的矛盾,致力于调和国际化与民族化之间的矛盾,致力于调和高等教育职能的分化和均质化,还要考虑“宗教和民族性在近代生活中的作用,战争与和平问题,解决冲突的一般题目,工业文明的病理,‘信息革命’的含义,环境的未来——包括人口爆炸的冲击,第三世界国家的前景”^{[2]209}等。

从组织机构看,巨型大学之“用”表征为组织机构的多元化。多元化首先指巨型大学的多个校园机构的合集。克尔指出,所谓的巨型大学不是指拥有多个校园的大学(multi-university),它由一系列分散的学院、系科和一些行政机构统合在单一的校园中。这些学院、系科和机构,既相互独立又要以共同的名称、管理委员会以及与之相关的目的维系在一整套群体和机构中。在此,巨型大学就像一个联邦共和国,通过宏观的调控把分散的相对独立的机构聚合在一起。其次多元化指巨型大学包含多元群体。克尔指出:“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一个不固定的、统一的机构。它不是一个社群,而是若干个社群:本科生社群和研究生社群,人文主义者社群,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社群,专业学院社群,一切非学术人员社群,管理者社群。”^{[1]10}多元群体还包括历届校友、议员、农场主、实业家,他们又同一个或多个社群相关联。

二、“用之殇”:巨型大学的挑战

(一) 巨型大学内部的不平衡

其一,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不平衡。由于社会应用性较强,自然科学家能够得到更多的科研拨款,有更多晋升的机会,在使用学校的各种资源上占有巨大的优势,“有更多的秘书和助手,更容易得到旅行出差经费和报销费用,”^{[1]35}并且在学术界内外有更高的地位和知名度。人文学者不仅没有自然科学学者那么多的优惠条件,并且由于好学生都去学自然科学而不选择人文学科,导致人文学者的教学评价不高。由于自然科学学者比人文学者能得到更多的科研拨款、晋升机会以及大量的学校资源,并且在招生上占有优势,导致自然科学学者越来越富裕,人文学者越来越偏激^{[1]35},从而影响学术职业的发展。

其二,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不平衡。随着联邦政府对科学研究的资助加大,研究生教育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主要表现在:研究生在接受指导方面拥有更多的优

秀教师。在科研环境方面,研究生拥有更好的设备、更多的奖金、更多的项目。大学教师为了得到政府的资助,竭尽全力地去做科研,他们关心的是经费的获取而不是教学任务,他们关心的是课题项目的申请而不是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他们关心的是指导研究生做科研项目而不是对本科生的教导。在这种情景下,教师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研究、咨询和研究生的指导上,忽视本科生的教育,从而导致本科生教学质量下滑。

其三,教学人员与非教学人员不平衡。围绕联邦资助的争夺,大学教师分为两类——教学人员和科研人员。一般来说,从事科研的教师往往是一些拥有教授职称的教师,他们没有教学任务,以学校的名义申请联邦资助的项目。没有教授职称的教师和学历低的教师只能从事教学,他们的工作量大,薪酬低,被重视程度低,大学教师人为地被划分为三六九等,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大学教师将分崩离析。

(二) 巨型大学外部的不平衡

从大学与大学的关系来看,巨型大学之间是不平衡的。联邦政府的拨款领域一般在国防、科学、技术和卫生保健等方面,并且政府官员比较喜欢在科学家比较集中的大学做科研,在这几个方面有优势的大学得到的拨款就比其他大学多。1961年,41%的拨款由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学获得,12%由纽约市的大学获得,6%由马萨诸塞州的大学获得,因为这些市州的大学比较集中而且科研实力比较强^{[1]51}。在1963年~1979年间,包括加州大学在内的6所大学有多于25%的项目经费,一流大学的办学实力越来越强,拉大了与其他大学的差距。

从巨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来看,其两者是不平衡的。政府拨款大多是学者与政府之间谈判确定的,学者可以自由支配研究经费,而不必经过学校的审核,这样教师就可以利用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来打压学校,“他们可以试图强行设立一个新的行政单位或者为他们自身的特殊建筑物分配土地,而无视大学的政策或优先项目。”^{[1]35}另外,经费控制权掌握在一些申请项目的教师手中,导致有些教师“结成非正式的联盟——如果你咨询我的项目,那我也应咨询你的。”^{[1]35}通过这种交换咨询,教师的总收入增加到惊人的水平。政府拨款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实际需要,因此,巨型大学对经费的处理要按照政府对项目资助的要求进行分配。这样巨型大学的自主权被削弱,政府对巨型大学的控制权则被加强。

从巨型大学与企业的关系来看,其两者是不平衡的。由于大学教师可以独自与企业合作,他们中很多人把企业看作是自己的母校,对大学的关心程度下降。正如,罗切斯特大学的校长艾伦·沃利斯所说的那样,大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教师的旅店,大学教师都成为研究型企业家。当他们离开大学时就把项目和资金随身带走^{[1]35},他们只是“服务于政府和企业的重大项目,”^[3]这样大学就成为了服务于企业的研究机构。另外,为了获得赞助商和捐助人的资助,大学纷纷建立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等专业学院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大学成为依赖赞助商和捐助人运作的机构。

三、“用之切”:巨型大学的回应

(一) 巨型大学对内部不平衡的回应

如何能够更好地去解决大学内部的不平衡?克尔从以下几方面阐述:

从自然科学学者和人文学者之间的不平衡来看,巨型大学应当“孕育一种平等协商的交流文化,”给予教师充分的自由、勇气和动力,根据自己的兴趣,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个人目标迈进,不必整天抱怨在项目申请、晋升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4]。

从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之间的不平衡来看,克尔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需改善本科生的教学指导,即大学要制定出既符合本科生的需要,又符合教师兴趣的课程表,给本科生讲授综合性的专业知识,把本科生培养成专家型的通才,要求每个教师把本科生当作预备研究生来培养,加强教师与本科生的沟通,实施结合拨款项目培养优秀本科生制度。

从教学人员与科研人员之间的不平衡来看,克尔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如下几个政策:增强大学的讲课功能,联邦部门应允许甚至鼓励博士后研究员和研究教授以1/4甚至1/3的时间来讲课^{[1]29};取消研究业务教授职位的设置制度;合理规定助教、助研和研究员等人员的教学与科研的时间、薪酬。

既然巨型大学服务于多个群体,那么,大学必须处理好各方利益集团有可能发生的冲突。不过,巨型大学只平衡各方的利益是不够的,它还要寻求突破和创新。在克尔看来,巨型大学必须维护永恒的真理,创造新的知识以解决当前出现的新问题。但巨型大学如何做到既平衡又能突破与创新呢?答案就是制定大学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战略规划能引导各利益集团向既定的方向前进,也可使各利益集团为长期的目标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例如,加州通过制定《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实施“研究生教育和专业教育在公立高等教育中对法律的教学和对医学、牙科和兽医学的研究生教学有唯一的管辖权;州立学院以本科教学和通过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教学作为它们的首要职能;建立一个与州教育委员会分离的州立学院管理委员会;建立一个法定的协调机构——高等教育协调委员会;大学和州立学院必须对加州居民免收学费;把初等学院界定为高等教育系统的一部分”等措施^{[2]151-153},使得加州的高等教育系统成为美国为数不多的能把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统合在一起的高等教育系统之一,成功地对联合平等和优秀做了一次尝试,被誉为“调解人民党主义和英才主义的一个具有特色的尝试。”^{[2]149-150}

(二) 巨型大学对外部的不平衡的回应

如何能够更好地去解决大学外部的不平衡?克尔从以下几方面阐述:

从大学与大学之间的不平衡来看,克尔认为,这个不平衡来自于各大学“疯狂地抢夺”联邦拨款。要解决这个问题,克尔提出了如下解决之道:大学应该寻求一系列

独立于联邦资助的其他资助;全州大学应当保持州政府资助的稳定;每个州的所有大学应当成立独立的校董事会,并且校董事会应科学地制定大学中长期规划;大学校长应当保持大学事务的管理权;大学应当提高公众对大学的支持力度^{[1]46}。

从巨型大学与政府之间的不平衡来看,克尔认为,巨型大学要善于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不能做任何让步,要勇敢地固守自己的阵地,如学术自由和办学质量。还要与政府之间达成协议,以法律文本的形式规定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且由全校教师来监督。校领导要以足够的警觉、足够的聪明、足够的灵活处理一些事务:防止政府利用拨款来抢占大学资源;防止治理权流入非学术的权威(特别是州长和政府官员)之手;防止教师利用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来打压学校等^{[1]169-170}。

从巨型大学与企业之间的不平衡来看,克尔认为,要平衡巨型大学与企业的关系,一方面,大学要与社会保持紧密联系,如要关注经济市场全球化及其对美国经济和高等教育的影响、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波动、大学教育的经济回报波动、新的电子技术等市场的新需求。另一方面,巨型大学要维护大学自身的独立性,即大学“非市场(non-market)的功能。”^{[1]17}这些非市场功能包括公民道德的训练、学生文化素养的培养、对社会批判能力的培养、公益性的学术研究等没有市场回报的大学之用。

在克尔看来,巨型大学要真正地处理好与政府、企业等外部机构的关系,校长必须做到要像狐狸一样左右逢源,平衡各个集团的利益,如寻求学生、教师、校董事会等内部利益之间的平衡,寻求学校与社会、政府之间的平衡,寻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平衡。同时,校长又要做到继续对如下新事物开展研究:最有利于大学发展的事情;允许传统大学的支持者与后现代大学的支持者进行公开深入地辩论,以便寻找合适的解决之道;对大学的未来进行深入讨论;必须面对知识大爆炸、人口大爆炸、旧行业没落、新行业诞生、信息化高速发展等现象;校长必须对革新力量保持高度的敏感^{[1]170-171}。

参考文献

- [1] 克拉克·克尔. 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M]. 王承绪,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 [2] 克拉克·克尔. 大学之用[M]. 高钰,高戈,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3] 安东尼·史密斯 弗兰克·韦伯斯特. 后现代大学来临[M]. 侯定凯,赵叶珠,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28.
- [4] 詹姆斯·杜德斯达 福瑞斯·沃马克. 美国公立大学的未来[M]. 刘济良,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

(收稿日期:2010-11-20;编辑:荣翠红)

University External Stakeholder Information Feedback Mechanism in Hong Kong

Jiao Lei, Xie Anbang

Page 66

Abstract: Presently, the universities'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in Mainland China is not perfect. The university often on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internal process of "students input-education-graduates output", but fails to collect the feedback information coming from external stakeholder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Hong Kong's university external stakeholder information feedback mechanism,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universities in Mainland China.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 university external stakeholder; evaluation information feedback mechanism; evaluating indicator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Practice in Higher Education for Foreign Students in China

Liu Yang, Wang Yiwei

Page 73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more and mo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hoose to study in China. Foreign students' education has been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olicy transformation and problems in foreign students' education in China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Opening-up policy. The paper points out some problems in scale, education level, structure of study field, management, and quality of foreign students' educ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also proposes some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for China's foreign student education.

Key words: foreign students; foreign students' education in China; policies for foreign students; foreign education; quality of foreign students; foreign education evaluation

Clark Kerr: Uses and Mega-university

Xiong Huajun, Li Wei

Page 81

Abstract: Clark Kerr, who was a renowned higher educationist in America, holds a view that, as a new kind of modern university, multiversity originates from the uses of university. However, it's just the uses of university that lead to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imbalances of multiversity, which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versity. Consequently, multiversity should actively respond to i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imbalances so as to boost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Key words: Clark Kerr; mega-universities; modern university management; uses of university; university development

Mr. Qian Weichang's University Management Thought

Cheng Mianzhong

Page 87

Abstract: Mr. Qian Weichang's university management thought, lies in the emphasis paid to management thought innovation to innovate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and structure based on human-centered idea. Its innovation and achievements find expression in dismantling "Four Walls" with innovation, in sticking to science-based development, in promoting competitiveness by integrating resources, in stimulating sustainable innovation with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strengthening dynamic management by us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stablishing democratic school system by depending upon the teachers, and in advancing administration by law, etc.

Key words: Qian Weichang; university as an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regulations; educational management thought; knowledge management; merged universities